

民國叢書

第四編

• 14 •



民國叢書

第四編

· 14 ·

中國民族自救運動之最後覺悟
鄉村建設理論

梁漱溟著

上海書店

梁漱溟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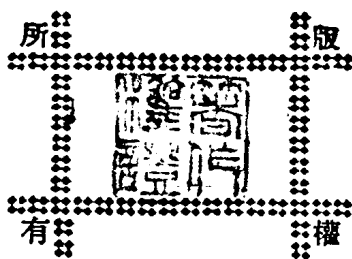
中國民族自救運動之最後覺悟

民國二十二年四月印刷
民國二十二年四月發行

中國民族自救運動之最後覺悟（全一冊）

◎定價銀一元八角

（外埠另加郵匯費）



著者

梁漱溟

發行者

中華書局有限公司
代表人 陸費逵

印刷者

上海靜安寺路
中華書局印刷所

總發行所

上海棋盤街

中華書局

分發行所

北平 天津 張家口 石家莊 邢台 保定
濟南 青島 太原 開封 鄭州 西安 蘭州
成都 重慶 長沙 常德 衡州 漢口 南昌
九江 安慶 蕪湖 南京 徐州 杭州 溫州
福州 廈門 廣州 汕頭 潮州 梧州 雲南
瀋陽 吉林 煙台 香港 新加坡

中華書局

(GPO: 11111)

中國民族自救運動之最後覺悟(村治論文集)

正集目次

一 主編本刊之自白	一
二 中國民族自救運動之最後覺悟	三二
三 我們政治上的第一個不通的路——歐洲近代民主政治的路	一一七
四 我們政治上的第二個不通的路——俄國共產黨發明的路	一六三
五 中國問題之解決	二〇三
六 敢告今之言地方自治者	二二一
七 山東鄉村建設研究院設立旨趣及辦法概要	二三七
八 丹麥教育與我們的教育	二五九
九 北游所見紀略	二九五
十 河南村治學院旨趣書	三三一

附集目次

勉仁齋讀書錄·····	三四一
悼王鴻一先生·····	三七三
敬以請教胡適之先生·····	三八一
『建設新社會才算革命』答晴中君·····	三九三
答馬儒行君來書·····	四〇三
敬答嚴敬齋先生·····	四一八

主編本刊之自白

我今執筆將與讀者諸君在本刊相見了；那麼，我想先要有一段自白。
這段自白可分四小節來說，其目如次：

一、我是怎樣一個人？

二、過去幾年的煩悶，產生今日的主張。

三、最近努力所在，和主編本刊的由來。

四、我對國民黨的態度。

一 我是怎樣一個人

我是怎樣一個人？知道者自是知道；不知道者慢慢地亦總會知道這似乎原不必提出向大家告白的。其如社會上相識與不相識的朋友，都容易對我有一種誤解；尤其是愛我而關心我的行止的朋友，因不了解我，而替我可惜或擔心。那麼，就頗有向大家剖說兩句的必要了。

大家誤解我什麼？這就是誤認我是一個學者，甚或說是什麼『哲學家』『佛學家』『國學家』

「……………這真實於兩面都不合適：一面固然糟踏了學者以及國學家；一面亦埋沒了我簡單純粹的本來面目。我原是個不學的人，更且從來不存求爲學者之一念。十數年來，雖亦屢任大學講席，亦屢有著述出版，都是誤打誤撞出來的；自家亦莫明其妙。在民國十年第一次出版的東西文化及其哲學自序上，我曾申白：

在別人總以爲我是好談學問，總以爲我是在這裏著書立說，其實在我並不好談學問，並沒有在這裏著書立說；我只是說我想說的話。我這個人本來很笨，很呆，對於事情總愛靠實，總好認真，就從這沾滯的脾氣，而有這本東西出來。我自從會用心思的年齡起，就愛尋求一條準道理，最怕聽『無可無不可』這句話，所以對於事事都自己有一點主見，而自己的生活行事都牢牢把定一條意義去走。因其如此，我雖不講學問，却是眼睛看到的，耳朵聽到的，都被我收來，加過一番心思，成了自己的思想。自己愈認真，從外面收來的東西就愈多；思想就一步一步的變，愈收愈多，愈來愈變；就成功今天這樣子。我自始不知道什麼叫哲學，而要去講他，是待我這樣做過後，旁人告訴我說：『你講的這是哲學，』然後我才曉得。我思想的變遷，我很願意說出來，給大家聽。不過此次來不及，打算到明年三十歲，作一篇『三十自述』再去說。此刻先把變遷到現在的這一步，發表出來，就是這本書。我要作我自己的生計，我自己的性情不許我沒有爲我生活作主的思想。有了思想，就喜歡對人家講；尋得一個生活，就願意亦把他貢獻給旁人。這便是我不要談學問而結果談到學問；我不是著書立說，而是說我想要說的話的緣故。

又在民國十五年春上，着手寫定『人心與人生』一書時，先寫得一篇自序，亦復有類此的申白：

（前略）明白這一層，則知我雖然初不會有意要講心理學，而到現在沒有法子避心理學而不談，雖然西文程度太淺，科學知識太淺，因而於現代學術幾無所知，原無在現代學術界來說話的能力，而心難自昧，理不容屈，偏處此際，固不甘從默謝短也。『人心與人生』之所為，凡以此而已！（註一）

談學問，在我祇是不得已，非有是心，以妄談學問之故而被人目為學者，在我祇是欲逃不得；亦不過學人家呼我為牛則牛應之，呼我為馬則馬應之而已耳！區區之志固不在此。乃社會上愛我的朋友，見我近年行事似在做一種社會運動或政治活動，多有疑訝我拋開學者生涯而別取途徑，擔我心將捲入濁流者，亦有認此種運動必無結果，勸我不如研究學問者。更有幾位有心人，認我往者從人生思想上指導社會，是根本重要的事業；乃若現在所用心的鄉治或村治之事則儘可有旁的人能作，而無須乎我來作；都勸我不要輕棄自己的責任。表示這類意思的信件我接得很多，其中儘有全未謀面的，至於當面見教，問我為什麼忽然改行的，更隨處都遇着。於此，我倒想起我的一位知己了——那就是胡適之先生。民國六年我游湘目睹南北戰爭之禍，歸來便發表一篇『吾曹不出如蒼生何』的文章，印成小冊子到處分送散佈。（註二）其時我在北大任課未久，適之先生亦是初從美國回來到北大。我

（註一）——『人心與人生』一書尚未曾出版，僅於十六年春為北京學術講演會講過三個月，約得原書之半，此序則曾一度刊登晨報副刊。

（註二）——『吾曹不出如蒼生何』一文，曾編入激賞齋文集。他很可以代表出我在時事感觸中的心理是如何；而十二年前我的思想見解亦於此可覓。那時節畫輪在夢想歐洲近代政治制度在中國之實現也。

這篇文章很得他的同情與注意，其後，事隔數年，他還提起來說，當日見了那篇文以後，即在日記上記了一句話：梁先生這個人將來定會要革命的。善哉！善哉！適之先生其知我乎！做社會運動自是我的本色，大家實無所用其疑訝。

更往上追述去，則民國元年我且曾一度熱心社會主義，達於高潮。當時我亦作了一種『社會主義粹言』的小冊子。無錢付印；從朋友處借得謄寫板，自己寫，自己印。印了幾十份，分送朋友。（註一）我二十歲以後之歸心佛法，實由此熱潮激轉而折入出世一路者。

更往前追述去，則清末光緒年間，我十四五迄十八九歲，在中學堂讀書時，專愛留心時事，天天討論我們應該『革命或立憲』的問題。始而我是傾向立憲論的；後來亦跟着朋友幹革命了。辛亥年我們組織所謂京津同盟會，亦鬧了些手槍炸彈的把戲。民國以後，我在家奉親，閉戶讀佛書，似乎是不問時事了。然而心裏仍拋不下。我前於輯印先父遺書時，作有『思親記』一篇，其中有一段，很可見當時情形。

（前略）公尤好與兒童共語，恣之言，一無禁。吾兄既早就外傳，及長又出國游；兩妹則女兒稚弱，健言者惟漱溟，公固關懷國家，溥亦

（註一）——『社會主義粹言』稿已不存，僅似共分七章。民國十二年游實州，爲第六中學講演，曾述及其中『社會主義之必要』一章的大意。六仲學生張雲爲我筆記，標題曰『倪維禎講演之一段』，初載於六中的刊物上，後載於北平大學日刊。

好論時事；於是所語者什九在大局政治新舊風教之間。始在光宣間，父子並嗜讀新會梁氏書，漢日手新民叢報若國風報一本，肆爲議論，顧皆能得公旨。泊入民國，漸以生乖。公厭薄黨人，而溥故祖之；公痛嫉議員並疑其制度，而溥力護國會。語必致逆，諸類於是，不可枚舉。時局多事，倏忽日變，則亦日夕相爭，每致公不歡而罷。然意不解，則旋復理前語；理前語，則又相爭。當午或爲之廢食；入夜或致晏寢。既寢矣，或又就榻前語不休，其間詞氣暴慢，至於喧聲達戶外者有之；悖逆無人子禮，嗚呼！痛已！兒子之罪不可贖矣！

此段原文，意在述我對已往悖逆的悔痛，然而父子兩人的一副呆氣，亦活露出來。以閉戶家居的父子兩人，表面上似乎任你天翻地覆亦可不管的，乃偏偏對於國事或社會問題，辨之必明，爭之必力，如此關切認真！凡是能從性情脾氣上了解我的人，就可知道我今日之社會運動正是『題中應有之義』；而一向不過濫廁學者之林，原非『爲學問而學問』者。

我實在沒有旁的，我祇是好發生問題；——尤其易從實際人事上感觸發生問題。有問題，就要用心思；用心思，就有自己的主見；有主見，就從而有所行動發出來。外人看我像是在談學問，其實我不過好用心思來解決我的問題而已；志不在學問也。我一向之談哲學，談心理學，始終是此態度。今日所談又涉及政治與經濟，仍不外此。用心思或云談學問，只居其中間的一段落，歸結還在行動，來自實際固不歸於實際不止也。追根尋源，全在有問題，全在問題之實際性。

二 過去幾年的煩悶產生今日的主張

問題之來，要我如何能不問呢？眼前沒有路走，逼到你討一箇解決，你能裝聾作啞麼？十年前（民國七八年間）我的心思不能不縈迴在東西文化問題上，而沉思不解，必得解決而後已，祇是如此。今日不能不沉思在這中國民族前途問題上，猶是如此。東西文化問題是怎樣逼着中國人討箇解決，還待我在東西文化及其哲學的緒論中指點講明；至於這民族前途問題之在今日，似乎無待我再講明了罷。因為那文化問題，要抽象些，或難理會得；而此則眼前實際的水深火熱之苦，數十年轉陷益深，茫無涯岸，不早令人心焦了麼！

『中國還會好，不會好？』『中國怎樣才能好？』差不多人人都會這樣發問了。然而世上亦正不少作夢發呆的人，在不可望的地方抱希望，彷彿沒有什麼問題似的。即我自謂愛發現問題的人，其始亦何嘗不作夢發呆。蓋問題所在的認取，固未易言；而不知問題所在者，往往容易謂無問題也。我在民國十年講演東西文化及其哲學時，即尙不曾發現今日的問題。那時模糊肯定中國民族儘有他的前途，在政治和社會的改造上，物質的增進上，大致要如西洋近代或其未來模樣；便是原書所謂『對西洋文化全盤承受』的一句話了。於如何能走上西洋近代政治制度的路則亦未之深思；產業如何得發達，分配問題如何解決，總覺此誠費研究，而政治果有路走，這些總不會沒有辦法。『假以時日，自然

都有解決的一天；』由今思之，這不是作夢發呆是什麼？十一年以後，方漸漸對於一向順受無阻的西洋政治理路懷疑起來，覺得『這樣辦法恐怕不行。』固然，西洋近代政治制度在西洋或中國人儘有不少提出批評修正的，尤以歐戰後爲著，却並不與我心中疑點相應。我所疑在其根本，我不是在大體承認之下，指摘其弊病缺短，欲爲之補充修改。我已不認中國人不能運用西洋政治制度是一時的現象。我疑心中國人之與近代政治制度怕是兩箇永遠不會相聯屬的東西！

誰若沒有夢想過西洋政治制度在中國的做行實現，則他不注意這做行的困難，實現的無望，自無足怪。然而我是做過這迷夢來的；十數年間，眼看着事實上是怎樣的格格不入，愈去愈遠；如何能輕易放過而不深求其所以然？於是，我就於旁人不留意的地方，發見了中國民族精神和西洋政治制度間的大刺謬點。（註一）固然，西洋近代政治制度在中國不能仿行成功，亦是因許多客觀條件的缺乏或不合。然而那都不是根本的窒礙，無可設法的困難。唯獨這中國古代文化之邁越西洋近代文化之處，涵育得中國民族一種較高精神，則是沒辦法的所在。——中國人將不能不別求其政治的途徑。然則中國人將走一種什麼途徑呢？別求途徑，能不能求得呢？或問說：中國人其將怎樣建設他的國家？其將怎樣度他民族團體的生活？我又想不出。從此以後，便陷入懷疑煩悶之中！

（註一）此層將在『我們政治上的第一個不通的路——歐洲近代民主政治的路』一文中言之。

我真是百般想，亦想不出一條道，假使中國到現在依然閉關自守，初未曾感受西來的勢力影響，那大概數千年的舊轍是不會改換的，根本不發生今日的問題。其如人類的歷史演化到這一步，使中國人一些逃免隱蔽不得。於是，這非開闢新途轍不可的形勢，就逼來了。雖然即在感受西來影響已八十年的今天，皇帝的再出現，從種種情勢上看，猶是頗有可能的；然而畢竟不行了。一切舊日迷信傳說觀念習慣等，在稍有知識的人已失墜毀喪無遺，同時其否認的心理却已很強地顯露在意識上。——這就築起了一大牆壁，使我們無法返回舊轍。『時代潮流所不許，』大家差不多皆會說這句話。語其內容，就是現時社會上自有其強有力的傾向，而這種傾向（帝制再興）則殊微弱，又且背逆着那有力的傾向。社會雖是多數人構成的，而說到這『有力的傾向』則恆視乎其間少數有力分子。——此於中國這樣的社會為尤然。孰為有力分子？就是較有頭腦較有知識的人，和較有勇氣較愛活動的人。雖然佔百分之八十多的蠶蠶農工，大都厭嫉民國而想望真龍天子，却不能在社會上形成一箇較強的傾向。反而由少數最先感受西來影響的有力分子，對皇帝制度的否認，斷絕了帝制再興的命運。十幾年的擾亂不定，就是指示舊轍的已經脫失，新軌的未立。

新軌之不得安立，實與舊轍之不能返歸，同其困難；而世人不知也。舊轍之所以不能返歸，其難在少數有力分子意識上明白的積極的否認他；新軌之所以不得安立，其難乃由吾民族『兼括有力無

力分子）不明露在意識上的消極的不予承認接受。多數無力分子，從其數千年迷信和習慣，對於新制度無了解不接受，這是容易知道的；而其不接受實更有在迷信與習慣之外者，則人多不留意。少數有力分子固明明爲新制度之要求者，而在其意識後背隱暗處同時復爲其拒却者，人尤不留意。故十數年政局之紛擾，政象之污濁，未嘗不指示我們新軌轍之消極的不被接受，而昧昧焉期望『民主』期望『法治』者，至今猶盈天下也。然而吾知其事之不可能矣！

中國人現下就夾在這有意識地否認舊轍，無意識地不接受新軌的中間。而更有難者：有意識的一面代表西來的時代精神；無意識的一面代表民族固有精神；二者有無可以融通之道，固已不可知；猶且是我們似乎照顧了精神，還應須照顧到事實——如何應付現在腳下所踐處的環境世界。世界是國際資本帝國主義競爭侵略的世界；我們本身是一箇爲其侵略下的生產技術簡拙，文化老衰的民族。不但要照顧到現在事實，似乎還應須照顧到未來變化；因爲現在的這世界局面又是不能長久的，其將轉變出一新局似有不容已之勢。於是我們更須於此時準備着變化，含容了未來，庶乎其可。那麼，這個問題就真難了！本來人類歷史走到了如今日的世界，可算奇詭艱難，猛烈複雜，前所未有，可說整個的世界都在問題中。而中國人此日所遭際的難題，不但是他有史以來未曾遭過，而且並世中別的民族亦不曾有可比例的呢！天似乎在試驗中國人能不能解答這個難題；中國人似乎很少有人能看

到這箇難題，我則看到，而愁悶不知所出。

在我發悶的期間，南方一種新興的民族自救運動開始了——這就是十三年的國民黨容共改組。我於這新運動的開始，雖經當時加入國民黨的共產黨領袖李守常先生從廣東回來對我談他們與國民黨合作的意義頗詳。（據他所談，法國式的革命在中國尚未完成，因而俄國式的革命尙不到時機，他們已放棄了暴力革命勞農專政的主張，而從事於國民革命，爭求國民的政治自由，如集會結社罷工等自由，以爲發達工人組織的地步。並說他們勸孫先生不要一味在軍事上用力，親自打東江，而應當到內地各省作一種國民運動。這所說似乎與他們後來的行動方向不符。然在當時確乎是真的。一九二三年『前鋒』是他們機關刊物，其中陳獨秀的『中國國民革命與社會各階級』一文發表的意思即如此。）然不久，我到山東曹州辦學去了，守常亦出國赴歐，消息遂隔。迨十四年廣東局面漸次統一，而黨的特殊精神亦分外著露；許多朋友身預其間的，都盼望我南去。我於此時才知注意，而似不無懷疑——或者至少是無解於我的煩悶。他們招喚之不已，至於督責備至；——陳真如先生，張難先先生來信猶多。他們說我不應該關起房門，高談哲學。蓋其時方以曹州辦學失敗回北京，謝絕各方邀聘，與一班青年朋友閉戶共讀。然在我怎能去呢？自己胸中猶疑煩悶無主張，要我跟他們一齊幹，還不甘心；要我勸他們莫幹，更無此決斷與勇氣；則去又何用？却是在大局沉悶陰霾之中，忽睹此一點

陽光朝氣，自足使我們同情和注意。求着了解他的心是很切的。於是就從我們朋友中分出三個人——王平叔，黃良庸，徐名鴻，——去廣東見識見識，歷練歷練；我自己則未去。

到十五年北伐，這種新興運動到達長江，全國震動，青年界尤爲興奮。我亦於九月南下，想到武漢會見我那朋友——原在廣東的朋友陳真如先生（銘樞）率師爲到武漢的先鋒隊；而且新去廣東那兩個朋友亦隨師北伐一路到了武漢。但結果則我未曾到武漢，只到了上海南京。——這就可以看出我自己之一面心焦，一面又沒定見，沒主張了。在上海却無意中看到國家主義派領袖曾慕韓先生。那天恰好是雙十節，他們用淺紅紙印刷的『醒獅』上面，發表有他們的『建國大綱』（原文標題記不清，其意若此。）若干條。曾先生對我談話甚多，一面批評國民黨，一面說明他們的主張。但他雖說得天花亂墜，一樣的無解於我的煩悶。換言之，我心目中的問題他們都沒有。

我旋即回到北京，而以時局之變——武漢反蔣，陳先生原是衛戍武漢的，現在站不住了，——我那兩朋友王叔平，黃良庸，於十五年底十六年初，先後祕密離漢北來；於是我們復聚於北京。自他們十四年南去之後，常常要以到處所觀察的報告於我。他們先在廣州晤會我們的朋友李任潮（濟深），伍庸伯（觀淇），陳真如，張難先諸先生；旋即隨同陳真如，白健生兩位入湘（接洽唐生智）；又回轉廣州；又隨師北伐，沿醴陵平江而到汀泗橋，賀勝橋，打吳佩孚，下武漢而衛戍武漢。每到一處，必有很多